

編 者 按

四年前，本欄曾經推出大躍進及困難時期大饑荒研究專題(1998年，總第48期)。作為中國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重大事件，它一直是研究熱點。其中，相當多數量的研究一直在死亡總人數的估算上爭論不休。本期三篇同一題材的論文，則別開生面，關注這一研究中過去被忽略的問題和事實。

陳意新採用人類學田野考察方法，精心選擇當時的重災區安徽省三個村莊作為個案，他的提問主要不是農民「為甚麼死亡」，而是「如何可以存活下來」，由此探討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在饑荒中的生存策略與鄉村政治結構的關係。他分析指出，傳統宗族領導權的延續或中斷對當時農民求生的機遇至關重要；逃荒、偷盜和瞞產私分等消極求生策略，在宗族領袖缺失的條件下會遭到國家權力代表的嚴厲處置而無法奏效；相反，獲得宗族領袖庇護的農民則贏得生存機會。李若建、高華則採用史學方法，充分利用90年代出版的地方史和檔案材料，分別對大躍進與困難時期中非正常死亡的死因和當時由政府推動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的群眾救荒運動，做出相當清晰的疏理和論述。

歷史常常在最簡潔的細節中復活。倖存者說：「漢佑二叔救了我的命」；死亡者變成統計數字，崗頭生產隊「全村55人全部餓死」。生存還是死亡？在哈姆雷特的獨白中，它是一種幻想式發問；而在1958年後中國大饑荒年代，卻是社會底層數以千萬計農民每天面對的真實而嚴酷的遭遇。